

战略与管理

Strategy and Management

“快文化” 要把我们带向哪里？

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/ 主编

王道政治的未来 干春松

文化误区与民族振兴 王佳泉

东亚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华文明圈的解构 李 河

经与经典：儒家复兴的经学、哲学与史学之途 任剑涛

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：儒家视角的观照与反思 陈 明

胡适思想的当代考察 任剑涛 许章润 陈明 陈志武 等

鬼话、童话与神话—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“西话” 支振锋

“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北洋政府” 研讨 高全喜 干春松 陈壁生 等

2011 — 2014 年精选本（全六册）

战略与管理

Strategy and Management

“快文化” 要把我们带向哪里？

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/ 主编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快文化”要把我们带向哪里? / 中国战略与管理

研究会主编. -- 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15.1

(战略与管理丛书)

ISBN 978-7-5443-5384-7

I. ①快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文化发展-研究-中国

IV. ①G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58762号

战略与管理: “快文化”要把我们带向哪里?

主 编: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

总 策 划: 万 胜

责任编辑: 王 琳

装帧设计: 黎花莉

责任印制: 杨 程

印刷装订: 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

读者服务: 蔡爱霞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
邮编: 570216

电话: 0898-66830929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9.25

字 数: 231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3-5384-7

定 价: 45.00元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目 录

- 刘 奇 “快文化”要把我们带向哪里? 1
(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)

胡适思想的当代考察 22

- 任剑涛 (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)
许章润 (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)
陈 明 (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)
高全喜 (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、教授)
陈志武 (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)
单世联 (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)
欧阳哲生 (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)
张凤阳 (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)
燕继荣 (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)
胡传胜 (江苏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)

- 李 河 东亚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华文明圈的解构 102
(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)

中国文化战略思考	134
陈嘉映 东西文化思想源流之差异：回顾与反省 (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)	135
陈 明 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：儒家视角的观照与反思 (《原道》杂志主编，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)	153
干春松 王道政治的未来 (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)	171
任剑涛 经与经典：儒家复兴的经学、哲学与史学之途 (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)	195
支振锋 鬼话、童话与神话—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“西话” (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)	232
王佳泉 文化误区与民族振兴 (北华大学文学院教授)	252
“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北洋政府”研讨	265
高全喜 转型社会中的思想家之地位 (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、教授)	266

袁 刚	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思潮 (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)	269
干春松	民国初年孔教运动与康有为的建国思想 (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)	276
陈壁生	民初的经学与建国 (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)	285
程广云	民权·军政·党治——北洋政府时期政治转型 (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、教授)	296

“快文化”要把我们带向哪里？

刘奇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之快，举世称奇。短短的三十多年，几亿人摆脱了贫困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，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，令国人欢欣鼓舞。但欣喜之余，人们发现，“快”已经成为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价值标杆，成为一种浸透人们生活的文化现象。飞奔的中国快车依然一路高歌猛进，千万只脚都踩在油门上，不见一只踩刹车的脚。尽管中央提出“又好又快”的发展要求，但经济社会的运行在“快文化”的左右下，一些方面已经初露动力机制失范、平衡机制缺失、公共秩序失谐、社会理性失控的端倪。我们不禁要问：“快文化”要把我们带向哪里去？

一、是什么孕育了“快文化”

“快文化”起于青萍之末，发于群体共鸣，成于价值导向。“快文化”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一种风靡社会的文化现象，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，是多种因素的凝结、多重力量的聚合。

一是“穷怕了”的求变心态促使“快”。改革开放以前，中国人

陷于集体贫困，尤其是“三年饥荒”，成为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梦魇。今天，过去的贫困状态已经打破，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，但“饿怕了”、“穷怕了”的心理障碍却挥之不去，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，加上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，穷人总担心哪天温饱又会成为问题，而富人则担心哪天自己的财富会一下子付诸东流，于是，当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推开阻碍发展的“路障”时，“终于逮住机会”的人们，就拼命抢时间，争速度。曾几何时，“时间就是金钱”的口号响遍神州。人们争分夺秒，唯恐错过机会，唯恐落在别人后面，快了还想更快，有了还想更有，有些人已经是亿万富翁，但还是心里没底，为挣得更多的财富，拖着病体，还要追星逐月，大干快上。亚健康状态遍及社会，过劳死现象屡见不鲜。在2010年9月14日的《洛杉矶时报》上，曾有人以《中国，因害怕贫穷而奔跑》为题描述中国的发展轨迹，一针见血，值得深思。

二是国际比较的差距牵引“快”。改革开放前，大家坐井观天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当时一个普遍的认识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需要我们去解救，有那么多人不如我们，中国人当然很幸福。国门一打开，人们顿时傻了眼，当大多数中国人想求一辆自行车而不得的时候，美国几乎家家院子里都停着两辆汽车。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，老百姓急了，政府也坐不住了，赶紧追赶，参照坐标就是发达国家，开口闭口必谈国际接轨，只要发达国家有的，我们也要有。这种追赶，对于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来说，更多地带有急于求成的理想主义、扬我国威的爱国主义和自尊自强的民族主义色彩，使“快”占据了道德制高点，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。由于差距过大，别人也在继续发展，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接上轨绝非易事，必须想尽一切办法，动用一切力量去追赶。这种“快”类似于心理学

上所说的“爱斯基摩结构”中拉雪橇的“力狗”，拼命追赶，越跑越快，越追不上，越要加速。中国人在这种动力的牵引下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“中国速度”、“中国奇迹”和世界吉尼斯纪录。近10年，中国GDP总量接连超过加拿大、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、德国和日本，坐二望一，不少人扳着手指，估摸着何时可以夺冠。

三是现代科技传导“快”。欲望、技术和智慧构成了现代哲学最基本的话语体系。技术是实现欲望的工具，现代科技则是“快”的翅膀。美国一位知名记者托马斯·弗里德曼在2005年写了一本书《世界是平的》，认为在源代码、搜索技术等十大现代科技的传导下，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、越来越平、越来越快。眼下，科技使庞大的地球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。居于地球两端的人们，相距几万里，但通过网络可以像与隔壁邻居一样聊天对话。1519年麦哲伦横渡大西洋用了整整70天的时间，而现在只需七个小时就差不多可以跑上一个来回；发生在纽约的“9·11”事件，一秒钟便传遍世界。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每秒8.16（2011年数据）千万亿次，一切“快”在现代高科技面前皆有可能。科技的传导，使天涯成为咫尺，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了距离，大家互相看着比着，谁跟不上时代的节奏，谁就可能被这个时代淘汰。于是，你追我赶，唯恐落后。科技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其本身是没有思想、没有识别判断功能的，高科技的快速传导，把握不好，很可能让人们集体走向“合成谬误”。

四是不断吊高的社会胃口推进“快”。马斯洛理论表明，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，就会有另一种需求取而代之。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年代，人们共同的欲望只是吃饱，吃饱了就是幸福，吃饱之后，人们的欲望变成无数个。特别是随着贫富差距快速拉大，物质上的反差导致心理上的落差，即使吃好穿好了，只要不如他人，就没有幸福感。人

们现在的兴奋点是要千方百计地赶超别人，不是求更好，而是求最好。各地政府动辄追求全国第一、世界第一，再不济也要弄个区域第一，无节制地扩张欲望，超现实地盲目追赶，导致发展越快，攀比越严重，对物质占有的欲望越强。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建立在比别人好，比别人强的基础上，而不是建立在自己幸福的平台上。你一年变富，我就要一夜暴富，你买耐用品，我就买奢侈品。有媒体报道，2012年中国就可能取代日本，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。早在1899年，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·凡勃伦在《有闲阶级论》中就分析过这种心态：“仅仅是占有财富没有意义，还需要确保财富能为你赢得尊重，因而你需要不断展示自身拥有财富的证据”。而奢侈品无疑是“展示证据”时最耀眼最合适的。加上现代传媒媚富、媚俗、媚精英的强势偏好，社会胃口被不断吊高，各种需求欲望与日俱增。

五是政绩工程刺激“快”。“出名要趁早，当官要趁小”，一些带着这种观念的人，为了赶上当官的“早集”，恨不得上台第二天就拿出政绩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任期是有限的，但想升官的欲望是无限的，为了把有限的任期变为往上爬的资本，都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干出一番看得见摸得着的大事来。为适应这样的潜规则，一些地方政府变成了“生产突击队”，千方百计在短时间内搞出各种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。比如，有的地方为了以最快速度提高城市档次，吸引领导眼球，来不及考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就整几个“地标建筑”忽悠一下。近年一些地方流行的“山寨建筑”，从天安门到中国馆，从水立方到鸟巢，从美国白宫到悉尼歌剧院，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有的地方甚至进行超大手笔的“造城运动”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只用5年时间，耗资50多亿，打造了一座占地32平方公里的康巴什豪华新城。这座设计人口为100万的新城现在的主要居民只有2万多公务员。美

国《时代》周刊 2010 年 4 月刊文称，康巴什新城的设计初衷是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市中心，但如今却成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品。该城因无人居住而被民间称为“鬼城”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在政绩工程的刺激下，一些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赶工期，求速度，导致朱镕基所说的“王八蛋工程”屡见不鲜，不仅一般的道路、桥梁、楼房，就是防洪的河堤、海堤，甚至飞机场、火车站也一样弱不禁风。楼脆、桥断、堤塌等现象时有发生。多年经验表明，历次政府换届都会推动 GDP 快速增高。改革开放 30 年已出现五次经济过热，而政府换届的 1987、1992、2002 年都出现过 GDP 达到波峰的现象，1997 年未出现波峰是由于亚洲金融风暴所致。换届后新班子上任，立即会出现投资高峰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政府换届后的三个年份（1993、1998、2003 年）均为“投资高峰年”。1989—1993 年间，前四年投资平均增速为 15.9%，换届后的 1993 年猛增为 61.8%；1999—2003 年间，前四年平均投资增速为 11.3%，而 2003 年高达 26.7%。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政绩工程的影子。“换届效应”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。有工程，才有政绩，有政绩，才能升迁。快出政绩，才能快速升迁，如果要从长计议，为子孙谋，没谁看得见，反被视为无能，很可能被淘汰出局，这就是制造政绩者的心理逻辑。

六是“日新月异”的价值标杆催生“快”。“日新月异”是汉语词汇中形容变化快最常用的修饰语。现在说哪个地方日新月异，就是对其最大的褒奖。“日新月异”已然成为人们价值标准、审美判断的一个标杆。一些地方对下面的要求是两个月组织一次检查，只看新项目、新成绩，旧的不看，逼得下面只好不顾一切造新的，变着花样出政绩。这个标杆有两个核心刻度，一是“新、异”，二是“日、月”，前者强调发展的状态，越新越异越好，后者强调变化的时间，越短越

频越好。在这种度量标尺下，一个个标新立异的事物在短时间内应运而生，进而演化成集体时尚。比如，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想搞出一个新异的作品，结果中国成了全世界奇形怪状建筑物的试验场。中国城市不仅比赛长“胖”，竞相扩张地盘，还比赛长“高”，摩天大楼一个比一个壮观。目前，中国百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达到 1154 座，排在世界前 10 位的高楼，有 6 座在中国大陆。设计的楼房不是把人们的工作和居住作为第一要素，而是作为设计者虚荣的载体。“日新月异”的价值预设还会直接导致一个后果：求统一而废个性，追逐“新”而忽略“好”。大家都在挖空心思追求奇异，而忽略了自己的特色，忽略了应该坚守的东西，应该传承的东西。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，蕴含着许多文明的基因，但在当下“快文化”的冲击下，已是凤毛麟角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“日新月异”一旦成为工作标尺，人们就可以对制定的规划和已有的成果视而不见，甚至否定历史从头再来，导致“规划”成“鬼话”。

七是动力机制失范导致盲目的“快”。动力机制，是人类社会赖以运行的最根本、最基础、最普遍的机制。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失去了规则，“快”就像脱缰的野马，任意狂奔。只要对自己有直接好处的就大干快上，没有直接好处的就拖着不干；不该快的快，该快的不快。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、新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前沿科技方面，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，本应快马加鞭、急起直追，但却没能快起来。相反，不该快的，却快得惊人。近几年出现的疯狂“三圈”就是明显的例子。一是“圈地”，改革开放以来已有 3 亿亩土地被圈占。2010 年全国出让土地收入就达 2.7 万亿，而农民仅得到少得可怜的补偿，地方政府只要脚下的土地，不管地上的农民；二是“圈钱”，利用股市为企业圈钱，股民数万亿的财富不

翼而飞。中国股市在进行大跃进式的扩容，2009年国庆以后，几乎以每周4只的速度发行新股。截至2011年一季度，已发行2400只左右。而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，平均每年仅8只。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也用了33年，平均每年24只。三是“圈人”，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、三产业，我们引以为豪的人口红利基本全被城市、工业掠走，只要农民进城干活，却不给农民工以市民权利。我们实际上是在饱餐城乡二元制度的红利，饱餐不平等权利的红利。在中国现行体制下，动力机制失范最容易导致一些部门根据自身利益而盲目快上项目。比如，未来两三年内，中国的高速铁路将达1.6万公里，位居世界第一，总长度超过世界各国加起来的总和。京津高铁是中国第一条时速300公里以上的城际铁路，开通以来仅一年多，亏损额已近十亿元。目前，中国有40多个城市在建或筹建地铁，平均每公里的投资高达4—8亿元。2015年北京地铁将达561公里，有望成为全球地铁线路最长的城市，远超1863年开通世界上第一条地铁的伦敦。更令人费解的是上海到杭州已开通了约需78分钟的动车组，约需48分钟的高铁，可还要修一条约需38分钟的磁悬浮线，虽然时间只缩短10分钟，但投资却达数百亿元，运营后巨亏已成定局。根据中国民航局2009年3月发布的统计公报，中国境内航空通航机场共有158个，许多中小机场利用率低，甚至出现“无机可飞”的闲置状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各地仍以大跃进的方式斥巨资扩建和新建机场，到2010年底，中国机场总数已达近200个。在动力机制失范的情况下，许多狂“快”都会出现，许多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
2010年，一项关于“全世界最着急的人”调查显示，中国人最没耐心。韩国《文化日报》一篇题为“失去缓慢美学的中国”的文章说：曾经，中国“慢文化”的代表故事“愚公移山”被写入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中，

但现在与中国人接触后发现，他们变得非常急躁。

今天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人们像一个个高速运转的陀螺，“快文化”则像一支为陀螺加速的鞭子。“快”已经不止出于节约时间这个单纯的理由，其背后有着更多急功近利的目的；“快”已经不止是喊在嘴上的口号，而成为一种写在纸上的制度；“快”已经不止是一项被动的外在约束，而成为一种自觉的潜意识行为；“快”已经不止是人们的生活节奏，而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化现象。

二、“快文化”的特性

狄更斯在他的《双城记》里有一段很富哲理的开场白，其中一句是“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，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”。“快”是一把双刃剑，合乎“规律”、不越“边界”、遵循“科学”的“快”能通向天堂，反之，只能把我们带往地狱的方向。这是由“快文化”的特性决定的。

一是加速性。据媒体报道，英国怀斯曼教授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联合调查的结果显示，过去十年，人们步行的速度加快了10%，大街上到处是步履匆匆的行人。跟物理学上的加速度原理一样，在社会学上，发展中的事物一旦失去约束，就如同物体之间失去摩擦力，将会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发展态势。德国社会学家彼得·博夏德在《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快》一书中的研究表明，人类社会以1450年为分界线，之前的几千年里发展节奏较为平缓；从1450到1800年为“开始变快”阶段，用了350年；从1800年到1950年为“加速变快”阶段，用了150年；1950年以后则进入了“越来越快”阶段。这种越来越快的加速特性，在中国表现尤为突出，比如城市化率，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初期，

150年内仅提高了4个百分点，而从1978年到2008年，平均每年就提高近1个百分点。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城市化速度更快，2000—2008年间，平均每年提高1.18个百分点。城市化率每增长20个百分点，英国用了120年，美国、德国用了80年，而中国只用了22年。

在这种“越来越快”的大环境下，“以快论英雄”的畸形偏好被社会普遍接受，“快”意味着一切，只要能快，就是本事。一些人在追求“快”的道路上，不择手段，不计成本，不顾后果。想小鸡快速上市，就注射激素，不管这种鸡能不能吃；想粮食增产，就引进转基因种子，不管这种粮食有没有害；想GDP快速增长，就拼命投资，拼命消耗资源，不管这种增长带不带血。这种超越规律的加速，就像一辆疾驰的列车，想减速都很难，更不要说停下来。比如高速发展导致通货膨胀问题越来越突出，国家早在2003年就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方式“刹车”，但由于加速度的惯性，9年上调了36次共15.5个百分点，却成效甚微，以致西方经济学家认为，中国治理经济的药方在逐渐丧失效果。

二是省略性。一味图快，只求结果，只能省略过程。朝，为田舍郎，暮，就想登天子堂，做任何事都巴不得一步登天。以前是十年磨一剑，现在是一年磨十剑。一些酒厂，省略窖藏甚至酿制的过程，用工业酒精与化学药品勾兑，十年的味道，甚至百年的味道，十分钟即可搞定；为缩短时间，一些动植物的养殖种植，采取人工手段缩短最基本的生命周期，一只鸡从孵出到上市的时间由过去的几个月减少到42天。一些项目，由于不顾物理反应和化学变化的基本时间要求，压缩工期，偷工减料，导致豆腐渣工程频频出现。央视2011年7月4日《朝闻天下》节目报道：作为世界上已建成的最长的跨海大桥——青岛胶州湾大桥于6月30日正式举行了通车仪式。当人们驱车行驶在大桥上时却

发现，有的地方还没有安装隔离护栏，已安装隔离护栏的螺栓很多都没拧紧，原本设计的照明灯也没安装。有关工程人员称，赶工期通车主要是为党的90岁生日献礼。开车行驶在这样的大桥上，真让人捏把汗。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对媒体感慨，他在一家书店看到一本《西方百部管理经典》竟然浓缩在200页的篇幅里。“只想阅读管理书籍的摘要，只想在5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50年所学的，这正是中国人打算做的。”大前先生的话可谓一语中的，点到中国人的软肋。很多地方为快速膨胀城市，只注重地上的建筑，而忽视地下的设施。逢雨必瘫已是绝大多数中国城市的梦魇。2011年6月，武汉、北京等多个城市因为排水不畅出现严重内涝。而19世纪的大文学家雨果就指出：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。

人的繁衍，必经十月怀胎，期限不够就影响健康甚至产生畸形。物的产生，理化性状反应必须给足时间，短了就会留下隐患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省略过程的“快”一旦成为文化，社会就会流行弄虚作假，破坏程序，不讲规则，少劳或不劳而获。这是眼下中国人心浮气躁的源头。用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的比喻解释这种现象最为贴切，“中国人心为什么浮躁，得到了天上掉下的一个馅饼后，不再做实事，都在等着天上掉馅饼。把捡着馅饼的运气当成自己的实力”。

三是裹挟性。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同化力和裹挟性。“快”一旦成为文化，便形成“漩涡效应”，不管你该不该快，能不能快，愿不愿意快，统统把你漩入其中，想躲都难。不少孩子希望家长是“富一代”、“权一代”，这样可以一步跨过二十年，学生中的比阔拼富，从幼儿园到大学普遍存在；一些作者为了快出成果，移花接木，不“论”而文，此风已泛滥成灾，逼得评审者不得不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检测真伪。有些名人不用“十年寒窗”，直接买个大学文凭，催生国内外卖文凭

成为一个产业。快文化的风潮逼得有条件快的要快，没条件快的也得快。不管是东部，还是西部，不管是工业大省，还是农业大省，谁也不甘落后。尽管国家“十二五”规划要求GDP增长率定在7%，但青海、宁夏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重庆等西部省份，纷纷设定了“‘十二五’期间经济总量翻番”的目标，对应的GDP增速都在14%左右，均高于“十一五”的GDP增速。在国家主功能区规划中已划定约800个县为限制开发的粮食主产区和400多个县为禁止开发的生态功能区，但这些地区的“十二五”规划，GDP增长目标均远远高于国家水平。中国快文化的旋风已经裹挟起周边邻国，就连代表着缓慢、谨慎和保守的“印度人的增长率”，也将在下一个五年调到10%，尽管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为代表的不少舆论认为，这么快的目标其实是幻想。

快文化的裹挟效应，导致跟风盲从，人人不必思考，不愿思考，不想思考，也来不及思考，社会以顺潮跟风、随波逐流为能事。一个不善思考的社会，不知会滑向哪里？

四是渐进性。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第一，从行为到心态再到制度。“快文化”起于青萍之末，开始只是在做某事上求快，随着一个个快速行为的累积，人的心态也渐渐发生了变化，不管做什么事，都想方设法快一些，再快一些，形成事事争快的定势。这种求快的心态又逐渐由己而人，推而广之，“快”不再只是隐匿于人们心中的自我节律，而是登堂入室，成为写在纸上、挂在墙上的硬性约束。事实上，文化与制度总是相伴而生，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就会生长出什么样的制度。翻看近三十年的规章制度和领导讲话，不难发现，各种“快”的表达词汇步步升级，20世纪80年代是“崛起”、“腾飞”，90年代是“超常规”、“大手笔”，新世纪是“跨越式”、“倍增型”，一个比一个气派，一个比一个给力。大前研一认为，人为地把国民收入增加一